

浙江省中共党史学会会员

论文选



前 言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省党史工作者在科研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就。为了总结与交流科研成果，将我省的党史科研工作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经省党史学会常务理事会议讨论，决定编辑出版我省党史学会会员论文集。

在编选论文的过程中，得到了会员们的大力支持。截止今年三月底，收到会员寄来的各类论文约 170 多篇。为了较充分、较全面反映我省党史科研的成果，决定先将 1983 年前会员在各级各类刊物上发表有关党史方面论文选编出版。今年内计划出版两集，其余部分将在 1985 年后陆续出版。

这次论文的编排，以论文内容所涉及的时间为序。凡属人物及部分资料整理、考证均放在后面。由于论文选编是一项新工作，会存在不少缺点，望大家提出意见，以便改进。

参加论文选编的有王学启（杭州大学），姚守中、徐绍全（浙江大学），李永棠（省委党校），王福年（浙江美术学院）。

1984 年 5 月

论文集目录

关于大革命时期的几个问题……………王学启（ 1 ）

五四运动和北京大学……………王水湘（ 31 ）

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李永棠（ 41 ）

“杭州共产主义小组”质疑……………叶炳南（ 52 ）

西湖会议与国共合作……………张鉴安（ 60 ）

共产国际与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倪维钧（ 69 ）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大革命时期

对农民问题的探索与实践……………姚守中 耿 易（ 90 ）

试论广州武汉时期国民政府的反帝外交政策

……………徐义君（ 111 ）

试论第一次国共统一战线的形成及其破裂……………张关钊（ 133 ）

试论《争取江西》的战略计划……………曹屯裕（ 148 ）

毛泽东同志对立三路线的认识和抵制

……………赵永钧 江哨野（ 172 ）

从土地改革的胜利看毛泽东思想的灵魂

……………张永泉 赵泉钧（ 192 ）

试论党的逼蒋抗日方针……………胡华丁（ 213 ）

汪精卫叛国投敌原因的探讨……………沈家善（ 225 ）

我党在皖南事变中反对顽固派的斗争策略……朱顺佐（ 235 ）

抗日战争胜利前后我党战略方针的转变……………张亦民（ 246 ）

试论学生运动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

——学习毛泽东同志有关学生运动的论述

……………郑元康（ 267 ）

解放战争时期的学生运动……………叶志麟（ 279 ）

毛泽东在革命战争年代对医药卫生事业的关怀

……………王瑞珍（ 290 ）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畲族人民的革命斗争……………王克旺（ 301 ）

感人的家书 珍贵的资料……………杨 光（ 312 ）

中共浙江省委的建立、改组及主要领导人的变

更情况概略（ 1927—1929年 ）……………沈自强（ 320 ）

宣中华同志入党日期考……………赵子劼 徐绍全（ 332 ）

关于任弼时在上海被捕情节的订正……………冯继烈（ 335 ）

正确的道路 伟大的成就

——论浙江的农业合作化……………罗 平 周 越（ 338 ）

朝鲜停战谈判情况概述……………王福年（ 363 ）

关于大革命时期的几个问题

杭州大学 王学启

一、党的创立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历史轮廓

根据“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原则，《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从党的创立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亦称为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发生的大量历史事件中精选了约六十件大事。这些大事的发展可以划分为彼此密切联系的五个段落，勾画了我们党幼年时期发展的轮廓。

（一）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一九二一年七月到一九二三年二月）

党的创建有一个过程。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初步结合，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出现，为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确定了党的最终奋斗目标——实行无产阶级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废除私有制，直至消灭阶级差别，也就是直到在中国建立共产主义的社会。从此，在中国出现了完全新式的、以共产主义为目的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显然，这是中国共产党同国际上一切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本质上相同的地方，是中国共产党

区别于一切资产阶级政党及其他剥削阶级政党的显著标志。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性，党的“一大”还没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的革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制定出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党在现阶段的革命纲领。而这样的纲领是作为一个完备形态的政党所不可缺少的。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主要功绩，就在于它根据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和对中国革命规律的初步探索，确定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为走两步，第一步在于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反动统治，完成民主革命任务，第二步再转入社会主义革命，从而为全国人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党在成立后所进行的实际工作，主要是组织和教育工人，发动了第一次罢工高潮。这次罢工高潮壮大了无产阶级的力量，提高了党和无产阶级在全国人民中的政治威信，为即将建立各革命阶级的统一战线奠定了无产阶级的阶级基础。但是，由于北洋军阀的血腥镇压，二七惨案以后中国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低潮。

（二）第一次大革命的准备（一九二三年二月到一九二五年五月）

二七罢工的失败，使我们党进一步认识到无产阶级孤军奋战是不能战胜强大的敌人的，必须建立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因而我党采取了更加积极的步骤去联合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中国共产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通过了国共合作的决议，决定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大会以后，党的各级组织对广大党员进行思想教育，解除对于加入国民党的疑虑；同时积极推动孙中山、廖仲恺等加速改组国民党的步伐。党的三届一中全会规定了我党“站在国民党中心地位”的方针及实施办法。

孙中山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在一九二四年一月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建立了第一次国共合作。从此，我党即通过国民党这个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恢复和发展工农运动，发动以废除不平等条约和召开国民会议为内容的人民运动。并同国民党合作，创建了革命军队，镇压了反革命商团的叛乱，使广东革命政府转危为安。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指出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和农民同盟军问题的重要性，制定了有计划地开展工农群众运动的方针。大会以后，党的工作迅速深入到广大群众中去，加强了党的领导作用。经过近两年的努力工作，各界民众已开始组织起来。这些有组织的群众已经比较普遍地具有反帝反封建的觉悟。这就为行将来临的大革命风暴作了组织上和思想上的准备。

（三）五卅运动——第一次大革命的爆发（一九二五年五月到一九二六年二月）

从一九二五年五月开始，在我党的领导下，上海工人、学生反对日本资本家枪杀工人顾正红，特别是反对五卅惨案的斗争，迅速发展成为全国范围的有各革命阶级参加的反帝革命大风爆。从此开始了中国革命史上空前未有的第一次大革命。在革命高潮中，广东革命势力平定了杨、刘叛乱，建立了国民政府和以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为政治骨干的国民革命军，胜利地举行了东征和南征，统一了广东革命根据地。但是，在北洋军阀统治的上海、武汉、青岛等城市的工人运动，由于没有革命军队和广大农民群众的有力支持，却不断遭到残酷的镇压，处境很困难。

随着革命运动的深入发展，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开始尖锐化，代表国民党新右派的戴季陶

主义和代表国民党老右派的西山会议派相继出现。一九二五年冬和一九二六年春，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批判国民党右派的谬论，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探索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在“二大”提出的中国革命分为两步走，“四大”提出的无产阶级应当领导民主革命的基础上，初步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

（四）北伐战争——第一次大革命发展为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斗争（一九二六年二月到十二月）

五卅运动的经验和教训表明，工人运动必须和农民运动相结合，民众运动必须推进到武装斗争的新阶段。这是五卅运动后革命继续发展的方向。一九二六年二月，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特别会议，分析了当时的敌我斗争形势，指出党的首要任务是从各方面准备北伐战争，决定在北伐必经的湖南、湖北、河南、直隶等地加紧群众工作，特别要组织和发动农民群众支持和参加北伐战争。这时，蒋介石也在准备北伐，但其目的是扩大自己的地盘和势力，建立独霸全国的蒋家王朝。为了实现这一野心，蒋介石在北伐前夕连续制造了旨在限制共产党人的“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事件。由于陈独秀实行妥协退让的政策，蒋介石篡夺国民党党权、军权、政权的阴谋得逞。革命预伏着危机。

一九二六年七月，国民革命军正式北伐，开始了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斗争。北伐军在广大工农群众的支援下，迅速消灭了吴佩孚、孙传芳两大军阀的主力，摧毁了他们在各地的反动政权。革命势力由珠江流域发展到长江流域。北伐战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工农革命运动亦随之蓬勃兴起。尤其是湖南、

湖北的农村大革命猛烈地发展，几千年来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权被打得落花流水，农民协会成了乡村的唯一权力机关。在城市，工人纠察队实际上也执行一部分政权的任务。这说明夺取政权的问题，已成为现实的根本问题。但是，陈独秀等从“二次革命论”出发，顽固地反对共产党领导工农群众夺取政权（《年表》原来缺少这方面的内容，准备补写），把北伐战争胜利的果实自愿地让给蒋介石集团。

（五）第一次大革命由胜利逐步转向失败（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到一九二七年七月）

北伐战争取得重大胜利后，中国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北洋军阀的剩余势力已经不能危害全局。蒋介石把南昌的总司令部作为反革命中心，同革命的武汉政府相对抗。他集中力量勾结帝国主义，拉拢和组织国内反革命势力，准备对共产党和革命群众发动突然袭击。这样，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由人民大众同北洋军阀的矛盾，开始转变为人民大众同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新军阀的矛盾。蒋介石集团已由革命的同盟者变为革命的最危险最凶恶的敌人。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者看不见主要矛盾已经开始变化，仍把蒋介石视为联合的主要对象，幻想能同蒋介石共同完成消灭北洋军阀剩余势力的任务。因此，陈独秀等不是集中力量发展工农运动，发动土地革命，扩大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以准备对付蒋介石的叛变，而是限制工农革命运动的发展，并尽力帮助蒋介石把势力扩大到上海、南京一带，幻想用这种让步的办法换取蒋介石由右向左，继续革命。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的特别会议，不顾反对的意见，通过了接受陈独秀主张的决议，共产国际的代表也同意这个决议。这就使

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从这时起，第一次大革命逐步由胜利转向失败。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一批无产阶级革命家对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进行了坚决抵制。但当时由于党还处在幼年时期，大多数同志对中国革命的规律还缺少必要的认识，对蒋介石的反革命本质还看不清楚，因而陈独秀得以坚持推行右倾投降主义。结果，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我党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使第一次大革命首先在上海、南京以及东南各省遭到失败。周恩来等统观全局，提出迅速东征讨蒋的正确建议，但为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多数决策者所拒绝。接着召开的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批评陈独秀犯了忽略同资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右倾错误，但对如何争夺领导权，大会却没有提出任何切合当时实际情况的办法，因而没有能够在紧急关头挽救革命。在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下，武汉汪精卫集团也由动摇转向反动，公然准备“分共”。陈独秀等实行投降式的让步，幻想以退让拉住汪精卫。汪精卫等却以为这是共产党软弱可欺，更肆无忌惮地煽动“分共”。七月十五日武汉国民党中央不顾宋庆龄等国民党左派的坚决反对，悍然举行“分共”会议，随后也同蒋介石集团一样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大屠杀。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至此遭到惨重失败。

以上就是《年表》所勾画的党的创立和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历史发展的轮廓。

二、大革命时期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说明

在编写《年表》的过程中，我们力求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大量收集和分析有关这一时期的中共中央

文件和第一手资料，并吸收近年来党史学界科学研究的新成果，对这一时期党的若干历史问题提出了我们认为比较合乎历史实际的独立见解，并增补了一些新内容。对若干具体史事也进行了考证工作。在这里，仅就大革命时期的若干历史问题向读者加以简要说明。

（一）党的三大反对两种倾向的问题

过去的一般提法是：三大一方面反对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另一方面反对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左”倾关门主义，不分主次。从当时党内的思想状况来看，主要倾向还是不愿意加入国民党、怀疑国共合作的“左”倾思想。从中央执行委员到普通党员大都是这样。西湖会议曾决定加入国民党，但由于思想上未解决问题，会后除了少数中央领导人加入外，绝大部分干部和党员并未参加，西湖会议决议在实际上没有贯彻执行。因此三大在讨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问题时又引起了很大的争辩。经过讨论，大多数代表接受了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指示，赞成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产业工人也不例外。但陈独秀等又支持马林提出的“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口号，张国焘等少数代表则反对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尤其反对产业工人加入国民党，害怕丧失党的独立性和混乱无产阶级思想。大会最后表决的时候，赞成加入国民党的主张得到大多数代表的支持，通过了国共合作的决议。根据这一情况，《年表》改变了过去不分主次的提法，指出：“多数代表着重批评了张国焘等怀疑国共合作的‘左’倾观点，也不同意马林、陈独秀提出的‘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右倾观点”。提法有所侧重，比较符合实际。事实上，直到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三届一中全会召开的时候，党内的“左”倾思想还浓厚存在着，以致第三次“大会决议，尚

未能充分执行”（见《中央局报告》）。

（二）党的三届一中全会问题

这是根据中央文件增写的新内容。这次全会是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五日在上海召开的。它进一步发展了三大决议，解决了三大所没有解决的三个问题。

第一，三大宣言说：“中国国民党应该是国民革命之中心势力，更应该立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三届一中全会决定，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须“努力站在国民党中心地位”。这是在当时条件下共产党在国民党内争取领导权的切实可行的办法。

第二，争取领导权的有效措施之一就是我党党员和团员要积极参加国民党的改组工作，凡国民党有组织的地方，如广州、上海、四川、山东等地，我党党员、团员一并加入；凡国民党无组织的地方，最重要的如哈尔滨、奉天、北京、天津、南京、安徽、湖北、湖南、浙江、福建等地，则应为之创设。这就是说，我们党要掌握国民党在全国各地的组织。

第三，争取领导权的又一个有效措施是参加国民党的我党党员和团员在国民党内建立“秘密组”（即后来的党团或党组）。一切政治性的言论和行动须受我党的指挥。这样，就可以通过这种党团性质的组织在国民党内贯彻我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发挥领导作用。

三届一中全会关于国共合作的基本精神是：我们党不仅要在全国范围内发展国民党组织，而且要站在“国民党中心地位”，并通过党团性质的活动影响和支配国民党的行动方向和大政方针，努力使国民党在实际上变成无产阶级领导下的统一战线组织。这个积极进取的精神，从国民党一大到二大基本上

得到了贯彻，使国民党获得新生。在政治上，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共产党人起草的以反帝反封建为中心内容的宣言。这个宣言所制定的政纲，实际上成为国共合作的共同纲领。在组织上，从国民党中央党部到各省市党部，大都以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为骨干进行了改组。国民党中央几个重要部门（如组织部、宣传部、工人部、农民部）和许多地方组织都由共产党员担负主要的领导职务。

陈独秀后来指责我们党“包办”了国民党，引起国民党右派的忌恨，犯了“很大的错误”。在国民党一大到二大期间，我们党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包办”了国民党，但“包办”是完全正确的，缺点是“包办”得还不够。由于陈独秀等自愿放弃领导权，“包办”的状况到一九二六年五月国民党中央通过《整理党务案》后才改变了，让蒋介石“包办”了国民党，篡夺了国民党的领导权。

（三）关于党的四大评价问题

“文化大革命”以前，一般党史论著对四大的评价较低。最近几年，党史界的评价开始高起来，有的人认为四大已经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思想。这个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

我们认为，对四大的评价应比过去高一些，但不能过高。应该承认，四大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农民同盟军问题，这是一、二、三次代表大会所没有正式提出的。这说明我们党在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道路上又前进了一步，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是有贡献的。《年表》对此是充分肯定的。但没有作出四大已经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这样高的评价。我们是从两方面考虑的：

第一，四大对领导权和农民问题的论述是有缺陷的。

先谈同资产阶级争领导权的问题。周恩来同志在《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一文中对四大有一段评语：“在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彭述之认为领导权是天然地落到了无产阶级身上，是‘天然领导权’，不用无产阶级去争。这就是没有看到资产阶级在争领导权。所以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在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蒋介石来了个反共，我们毫无准备”。这既是对彭述之的批评，也是对四大的批评。在四大《关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中就反映出“天然领导权”的思想。决议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还未形成一个独立的阶级，“因外国帝国主义阻碍其发展，现在还在由买办官僚的资产阶级到民族的工业资产阶级过渡中，所以还不能参加民族革命运动”。既然作为阶级的民族资产阶级还未形成，又不能参加革命，无产阶级政党当然就用不着去同它争夺革命领导权，领导权会自然而然地落到无产阶级身上。实际情况怎样呢？民族资产阶级不仅早已形成，并时刻同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如果无产阶级不去争，领导权还是空的。毛泽东指出：“从资产阶级占优势到无产阶级占优势，这是一个斗争的长过程，争取领导权的过程”。不去“斗争”，不去“争取”，哪里会有领导权？

再谈农民问题。四大《关于农民运动之议决案》对农民问题的分析也是有缺点的。一九三〇年五月，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说：“我们调查农民成份时，不但要知道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这些以租佃关系区别的各种农民的数目有多少，我们尤其要知道富农，中农，贫农，这些以阶级区别阶层区别的各种农民的数目有多少。”一九五六年九月，毛泽东在《我们党的一些历史经验》中讲到第一次大革命时期的情况时又说：那时“我们许多同志从平面看农村，不是立体地看

农村，就是说，不懂得用阶级观点看农村。后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才用阶级观点看农村。原来农村不是平面的，而是有富的，有贫的，也有最贫的，有雇农、贫农、中农、富农、地主之分”。现在看来，四大关于农民问题的决议案就有“从平面看农村”这个缺陷。决议在分析各种农民时，着重指出有佃农、自耕农、自耕农兼佃农、半自耕农等区别。这主要是从租佃关系而不是从阶级关系来区分各种农民。实际上，在佃农里面有贫农、中农、富农之分；在自耕农兼佃农、自耕农中，也有贫农、中农、富农之别。主要以租佃关系来分各种农民，就难以解决在农村中我们党究竟依靠谁、团结谁的问题。四大决议中有一处提到“中农、佃农、贫农、雇农”字样，同时又说在广东农民反对大地主的斗争中“中农常立于大地主一方面”。这种同佃农并列并“常立于大地主一方面”的所谓“中农”到底是属于什么阶级？我们认为是很值得怀疑的。

此外，四大决议还对农民运动规定了许多限制，说广东的农民运动有时“提出的口号太高，范围太大”，“犯了一种幼稚病”，并且规定“不宜轻率由农会议决实行减租运动”等等。当时农民运动还刚发动起来，四大就以为过火了，要加以限制，这显然是错误的。

从上述可以看出，四大提出领导权和农民同盟军问题，这的确是一大进步，但也有很大缺陷，还不能说真正解决了领导权和农民问题。

第二，从实践的观点看，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初步形成，是在五卅运动之后，而不是四大之时。

理论来源于实践，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一九二五年五月以后，我们党领导了席卷全国的五卅反帝革命风暴。在五卅运动这个政治大舞台上，各个阶级都作了充分的表演，无产

阶级怎么样，小资产阶级怎么样，资产阶级又是怎么样，都看得很清楚。如果说中国社会各阶级在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在这以前还表现得不十分明显的话，那么现在是很明显的了。五卅运动这一伟大革命实践使我们党对中国革命规律的认识大大提高了一步。四大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还只是一种一般的口号。五卅运动之后，我们党才真正从自己的实践中、从活生生的体验中认识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性。这表现在我们党许多同志（如瞿秋白、邓中夏、恽代英、毛泽东、刘少奇等）所写的有关五卅运动的文章中。就是陈独秀在这次运动中也曾经一度改变了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看法。他本来幻想资产阶级能领导民主革命，现在一看实在不行，不仅不能领导革命，而且已变成“不革命”的阶级了。他说：“五卅运动起时，我们绝不死守成见，我们颇幻想在此次全国民族运动奋起大潮中，中国资产阶级或不能不相当的与一切革命的民众合作了。可是在事实上，中国资产阶级对于此次民族运动的态度，使我们的幻想终于是一个幻想，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不革命’这一公例，居然又在中国民族运动中证实了。”他甚至说中国资产阶级“已是全世反动的资产阶级之一部分”（《向导》第136期）。陈独秀在这里看不到民族资产阶级同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的区别，也看不到民族资产阶级既“需要革命”，又“怀疑革命”的两重性，笼统地说整个中国资产阶级都“不革命”，是“全世界反动的资产阶级之一部分”。这种看法是片面的。到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中国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又在一定程度上参加革命时，他又可能再转而对资产阶级寄予幻想。尽管陈独秀对资产阶级的看法后来又变回去了，在五卅运动中，他改变了原来对资产阶级的看法，比较明确地看到它有妥协性、反动性，说明五卅运动对于全党思想水平、理论水平的

提高起了多么大的作用。

四大为什么能够提出领导权问题来呢？这主要是共产国际的作用。早在一九二三年五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给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指示中就提出：“毫无疑问，领导权应当归于工人阶级的政党”。从此，瞿秋白、邓中夏等也先后提出无产阶级领导中国民主革命的问题。许多同志在国民党内努力争取站在中心地位，实际上也发挥着领导作用。但是，共产国际的这一指示，同它以前所说的中国“工人阶级尚未完全形成成为独立的社会力量”，是自相矛盾的。在陈独秀等看来，这不是“毫无疑问”，而是“疑问很多”的。因此，当时中共中央的文件没有正式提工人阶级领导权的问题。据郑超麟回忆（他参加过四大）：一九二四年上半年，共产国际东方部和中共旅莫支部共同讨论过一次中国革命问题，这次讨论的结果，一致认为工人阶级应该是中国国民革命的领导者。彭述之参加了这次会议，并把这一精神带回国内，在一九二四年十月、十二月先后发表《中国工人阶级的责任》和《谁是中国国民革命之领导者？》两篇文章，说中国资产阶级不可能领导革命，只有工人阶级才有资格充当领导者，而且“中国工人阶级天然（“天然”，也可以说就是对“毫无疑问”的一种解释——编者）是国民革命的领导者”。由于共产国际的一再指示和党内许多同志也赞成这些指示，四大终于正式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但是正如周恩来所指出的：“大革命时期有一个彭述之，他写了一篇文章，说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是天然的，不要争！这和毛泽东同志关于争领导权的思想完全相反。”彭述之参加四大并参与大会决议起草工作，结果把他的“天然领导权”的思想也带进了决议。这个过程说明，四大提出领导权问题固然有国内党内的一些因素，但主要是依据共产国际指示的精神。由